



受到攻击： 美国的一个故事

〔美〕奥利弗·诺思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D77125
N 18

354506

受到攻击：美国的一个故事

〔美〕奥利弗·诺思 著

贺锡嘉 王家骥 李 群 蔡 南 译
傅 荫 蒋正豪 陈正容 陈文伯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Oliver L. North
UNDER FIRE: AN AMERICAN STORY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U. S. A.

根据美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范建民

封面设计：丁品

受到攻击：美国的一个故事

〔美〕奥利弗·诺思著

贺铸 李 蕊 南 译
傅 荫 蒋正彦 陈正容 陈文伯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4 字数：359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7-5012-0388-1/K·90 定价：6.80元

出版说明

美国政界的丑闻不断。继70年代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之后，要算是80年代的“伊朗门事件”最为轰动政界了。

1985年至1986年间，美国政府的某些权力人物为换取美国入质获释，秘密向伊朗出口武器，并将所得款项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此举直接违反了美国国会不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禁令。1986年11月此事被揭露后，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伊朗门事件”。国会为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调查，其重点是总统是否知情和作何指示。调查中许多要人被控涉嫌这一丑闻，但对关键问题守口如瓶。调查结果，除了一些次要人物被判有罪外，有关总统是否知情一事，结论是“查无实据”。“伊朗门事件”也因此不了了之。

1991年9月16日，被判三年徒刑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诺思经法庭重审后宣布无罪释放。诺思是“伊朗门事件”的核心人物，直接参与过这桩秘密交易，他被释后不久写出了这部回忆录，终于使“伊朗门事件”的真相曝了光。

为了便于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伊朗门事件”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争斗的真相，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对于作者在书中为开脱罪责、美化自己而渲染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和宗教观，相信广大读者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贺锡嘉（致谢、前言、第一、二章）、王家骥（第三、四章、附录）、李群（第五、六章）、蔡

南（第七、十四章）、傅荫（第八、九章）、蒋正豪（第十、十一章）、陈文伯（第十二、十三、十七、十八章、后记）和陈正容（第十五、十六章）。

目 录

致谢	1
前言	4
第一章 “解除他的职务”	7
第二章 秘密中的秘密	21
第三章 另一个世界	37
第四章 成长的岁月	67
第五章 战斗	91
第六章 新的生活	126
第七章 波托马克河上的拜占庭	158
第八章 近距离观察	181
第九章 “我们抓获了逃犯”	206
第十章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229
第十一章 肉体 and 灵魂	251
第十二章 形象问题	275
第十三章 第二渠道	289
第十四章 残局	318
第十五章 在闪光灯和摄影机前	342
第十六章 罗马大竞技场	364
第十七章 秘室中的确凿证据	392
第十八章 回顾	420
后记	427
附录	432

致 谢

写一部书绝非易事，而秘密写作则是一种特别的挑战。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我的出版商决定把这本书作为一项秘密活动。

为了完成本书，威廉·诺瓦克和我在杜勒斯国际机场的一家旅馆里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时间会谈，并通过电话和传真机进行合作。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比尔^①都提着他那部便携式电脑乘飞机来到这家旅馆，在一层订一间有后门通往停车场的房间。他住下来后，我就驱车偷偷摸摸地去和他会面。我们总是在房间里订午饭和晚饭；在服务员送饭时，我就躲在盥洗室里。这个不了解情况的服务员一定认为这位诺瓦克先生真是奇怪，他似乎总是住这间房，接待一位想象中的朋友。

尽管这项工作很艰难，但是我与比尔的讨论既富有成果，又十分有趣。我赞赏他对细节考虑周到，提出有卓识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他那体会幽默的微妙感。我还要感谢琳达·诺瓦克，她不仅体谅我们紧张忙碌的日程，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甚至在她丈夫和我将要完成本书时，她还为他生了个孩子。谁说世上不再有奇迹？

我要特别感谢尼科尔·塞利格曼，他是我从威廉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聘请的一位律师。他对我的帮助特别重要。

有许多人帮我把这个故事从法庭审讯变成了文字。

我的母亲搜遍了她保存的旧像册和一叠叠信件，她向比尔和我讲述了我早已忘却或试图忘却的年轻时的故事。我的兄弟杰

^① 威廉·诺瓦克的爱称。——译者

克、蒂姆和妹妹帕特也提供了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些花絮。

迪克·邦纳、米尔德里德·约翰逊、汤姆·吉本斯、鲍勃·鲍斯和拉斯·罗伯逊，在30多年前就开始为本书做出了贡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对我的帮助有多么大。

海军学院的那些忠实朋友对我的支持不胜枚举，他们是：埃默森·史密斯、里德·奥尔森、鲍勃·艾森巴哈、鲍勃·厄尔以及我的同班同学杜威·贝利奇、杰伊·科恩、马克·特雷纳、菲尔·霍夫和汤姆·海斯。

我在很久以前的那场战争中的战友们后来都来找我，他们是：鲍尔·古德温、比尔·哈斯科尔、里奇蒙·奥尼尔、巴德·弗劳尔斯、阿尔特·范迪维尔、埃里克·鲍恩和约翰·拉普亚诺。那些自称“蓝手下的家伙”^①在过去和现在的战斗中都帮我得以生存下来，他们是：温德尔·托马斯、埃弗特·惠普尔、厄恩尼·塔顿、兰迪·赫罗特和吉姆·莱纳特。

几位将军：卢·威尔逊、罗伯特·巴罗、P.X.凯利和汤姆·摩根赋予海军战士们喜欢称呼自己的“兄弟帮”一词以新的含义。迈克·谢里登准将、皮特·斯特纳中校、吉尔·马克林少校、杰克·霍利上校和拉里·威克斯上校也是如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解释这个词，他们的忠诚都是始终如一的。

当我离开服役25年的军队，开始在社会丛林里披荆斩棘开辟一条道路的时候，地方上有几位人士对我进行了指导：华盛顿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哈里·罗得和伯尼·斯温；本·埃利奥特，他们在幕后给我提供了帮助；杜安·沃德，他使我得到了我所期待的工作；以及杰里·迪门纳和戴夫·瓦林斯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帮助我生存了下来。

如果没有埃德·布罗纳中将与他的妻子多特以及约翰·格林纳尔德少将和他的妻子诺伍德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

^① “蓝”指本书作者诺思，系在越南战争中他手下人称呼他的外号，参见第五章。——译者

布赖恩·考克斯牧师给我了一双慧眼，使我能审视我对基督教的信仰，也使我更好地理解到在逆境中如何对上帝赞颂膜拜。撒德·希思则教我怎样按上帝的旨意生活。

我很想感谢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结识的戴维·雅各布森、安迪·梅辛、埃伦·加伍德和肯·德格拉芬雷德，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乔·费尔南德斯、杜威·克拉里奇、乔治·凯夫和其他几个人。如果我真那样做了，他们肯定会受牵连。

里奇·米勒和杰布·斯潘塞帮我找到并研究了谁也找不到的材料。而我忠实的秘书玛莎·菲什鲍则帮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核实。

威廉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布伦丹·沙利文、巴里·西蒙、约翰·克莱因、尼科尔·塞利格曼和特里·奥唐奈，是我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已经成了我的朋友。他们能干的助手朗达·里奇、布伦达·李、卢·安·泰勒和贝蒂·多纳休·范诺伊也自始至终向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从一开始，鲁珀特·默多克就深信，我们能够悄悄地很快把这本书写出来；而哈珀科林斯出版社的比尔·欣克、格拉迪斯·卡尔、汤姆·米勒、吉姆·福克斯、特雷西·迪瓦因和吉姆·霍恩费希尔，帮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宗德范，吉姆·伯克、斯坦·冈德里和斯科特·博林德尔的帮助特别有益。文森特·弗加帮我在堆积如山的照片里找出了合用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那些日日夜夜给我以鼓励的人：我的妻子贝特西，我的孩子泰特、斯图尔特、萨拉和多宁。多宁睡觉前不再要我讲故事，这样我才能腾出时间写这本书。在这场风波中，我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些好朋友：伊莎贝尔·施莫克、玛格丽特·埃丝特·鲍威尔、奥珀尔·罗兹、伊莎·萨利巴和杰米·惠勒。

我要感谢默特尔·法莫希、安·基恩、史蒂夫·阿克塞尔罗德、特别是塔雷恩·梅特森，他们暗中对我进行了帮助。

拉里·沃尔什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前 言

无论是好是坏，人的一生总是与原来期望的不一样。我就是这样。1961年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跻身于政府的较高层。当然我也绝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写入某一历史篇章的一起激烈政治纠纷的中心人物。

这本书写的是我个人的故事。我把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段历史的定论留给别人去写——假如他真能写出来的话。国会调查人员的报告和证词已经汇编成好多本书，但我怀疑他们中有谁知道全部真情。在这个事件中我是对的，而且我意识到仍然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

虽然我在书中常用“伊朗—反政府武装”^①这个词，但实际上我是用词不当。准确地说，“伊朗—反政府武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采取的两项截然不同的秘密行动。其中之一是试图打通与伊朗革命政府的联系。这一行动包括向伊朗出售军火和使被扣押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获释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功。另一项是在美国国会迫使中央情报局不再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后，共同努力保持对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援助。这两项计划后来终因财政上的关系以及有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同时参与了这两项行动而被联系起来。

在一些章节中，我叙述了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的某些故

^① 其中的“反政府武装”系指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译者

事，它们肯定对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产生了影响。例如，我知道我在越南战争时担任排长的经历总的来说左右了我对中美洲，尤其是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感情。我的成长历程和我所接受的价值观念肯定影响了我对贝鲁特美国人质的态度。

我不要求读者同意我所做过的和没有做到的一切。在我被解职后的五年中，诋毁我的人常常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加以戏剧化，然后再夸大。我的某些支持者也是如此。我当然感谢他们认可我，但我既非圣贤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回首往事，我对我的许多成就感到自豪，但也对我做过的某些事感到遗憾。

虽然我写的许多事情是在过去10年间发生的，然而世界的巨大变化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现在，大部分东欧国家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像里根总统一贯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自身证明了它是一个具有致命缺点的制度。我记得曾在电视上看到推倒柏林墙时的情景。当时我热泪盈眶。我的小女儿多宁跑上楼去问：“妈，爸爸怎么了？”

当然，爸爸没事儿。我只是激动而已。我知道终究会变的，但我没有料到在有生之年自己能目睹这一切。1990年，我再一次体验了这种感情，尼加拉瓜人民在11年中第二次推翻了一个残忍、腐败的政权。1991年8月我看到第二次俄国革命，鲍里斯·叶利钦挡住了一辆苏联坦克时，我又一次沉浸在这种感情之中。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五年半中，我的很多时间花在了营救贝鲁特被扣美国人质的工作上。我这一生做过许多困难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难办和令人痛苦。大部分工作都是绝对秘密进行的，否则对人质和其他国家的某些人显然会造成危险。在我写这本书和描述这些努力时，我曾祈求上帝在我完成这本书时，这些人都已归来并与家人团聚。

我们在里根政府里工作的人，有幸参与了这些伟大的变革。我热忱希望这些发展能永恒保持，希望在东欧、中美洲以及我们常称之为苏联的地方发生的惊人事件也能降临古巴、伊拉克、伊

朗，甚至黎巴嫩这类国家。

这本书涉及了与我在政府和政府之外共过事的某些人。虽然我对其中的几位不敢恭维，但是经过这些年我了解到他们多数都是值得尊敬的好人。像我一样，他们突然被卷入一些重大事件当中。也像我一样，有时他们不能完美无缺地作出反应和应付一切。

其中的某些人生命还处于危险之中，有些人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我们永远不能公开表示感谢，对他们作出的贡献不能表示敬意，或者对他们经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甚至不能给予承认。尽管我在书中没有提到或者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但是这本书对他们是一种敬意。

奥利弗·诺思

1991年9月16日于纳尔尼阿

第一章

“解除他的职务”

被人解职从来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这种事一般是在门背后私下进行的。然而对我的处理却与众不同。屋里挤满了人，四门大开，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公民静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1986年11月25日中午12点零5分，罗纳德·里根总统和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步入座无虚席的白宫新闻发布室，他们将会见新闻界并面对各电视台的无数摄像机。我坐在老行政办公楼的办公室里观看现场直播情况。总统在发布会上解释说，并没有人告诉我们与伊朗的秘密军火交易情况，他已请司法部长调查此事。尔后，他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①已辞职，奥利弗·诺思中校“已被解除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

什么？

没有等我回过味来，总统已把麦克风递给了司法部长米斯，然后离开了大厅。

这时，米斯扔下了一颗炸弹：“在转让军火的过程中，美国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将。下同。——译者

向以色列提供了军火，以色列继而将这些军火转让——实际上是卖给了伊朗代理人。以色列和伊朗双方代理人的这笔交易所得部分款项已经交给了中美洲反桑地诺政府的武装力量使用。”

一句话，向伊朗出售军火的部分收入已经到了尼加拉瓜抵抗力量，即反政府武装之手。记者们对米斯说的话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白宫记者们实际上沉默了有一两秒钟。

接着开始了连珠炮似的提问。

总统知道这件事吗？

米斯：在我向总统报告之前，总统一无所知。

什么？

那么究竟谁知道这件事？

米斯：美国政府中对这件事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有诺思中校。

什么？！

米斯：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知道有这类性质的事情，但他没有进一步调查……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我本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谁都不知道这件事。

什么？！

“诺思中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人问，“会不会对他起诉？”

米斯：目前我们正在从法律角度调查此事，看它是否涉及任何犯罪性质的行为。

犯罪行为？！

自一家贝鲁特杂志《风帆》周刊揭露了我们的伊朗行动之后的三个星期里，政府的战略是保持缄默，但是态度十分明确：绝不能让它成为另一起水门事件。尽管水门事件涉及若干违法行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最严重的

错误不是窃听行为本身，而是试图掩盖事实。

因此在1986年11月，有人——也许是罗纳德·里根，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南希·里根——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发生或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绝不能有丝毫试图掩盖的迹象。在新闻界可能造成任何损害之前，白宫应主动公布事实真相。

搞政治有一条基本规律，谁能把自己一方的说法先报道出去，通常在以后的发展中谁就能主宰乾坤。政府在这里运用这条规律也确实灵验，政府并不是仅仅出于战略考虑才披露“转移”问题的（人们不久会知道这一切）。他们将它公之于世是因为三天前司法部长在我办公室看见了一份有关这件事的备忘录（我原以为我已销毁了），他着实吓坏了，认为如果这一内容像水门事件那样先在报纸上披露出去，那么将使里根总统陷入极度严重的政治困境。

例如弹劾。^①

政府决定将重点放在“转移”问题上，这样做确实大有好处。这个异乎寻常的情节是那样富于戏剧性，那么刺激，确实可能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事件的其他重要方面吸引过来，如总统及其

^① 直到1989年开庭审讯我时，在我的律师布伦丹·沙利文盘问司法部长米斯的过程中，米斯透露出他是多么担心可能提出弹劾问题。

沙利文：事实上，当时你估计，除非做些什么安排，否则对出现那两件事（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的强烈反响很可能导致总统下台，是不是？

米斯：是。

沙利文：事实上，11月23日和24日人们在讨论，除非由政府、你和总统本人将所得余款交自由战士使用的事实公之于众，除非你们采取主动，否则可能导致国会提出弹劾，是不是？

米斯：是，我们担心我们的政敌可能会采取这种策略。

格塞尔法官：他在问你：你与总统商量过这件事是不是？

米斯：我想我与总统商量过这件事。我肯定同像办公厅主任这类高级官员商量过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具体提到“弹劾”这个词，但我肯定与他们讨论了可能对总统和政府造成的严重后果。

高级顾问们还知道和批准过什么。如果能够巧妙地使人们相信,这个可能已经发生的可怕事件应完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中级助理人员(也许由他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顾问)负责,这个人完全是自作主张(尽管人们认为不太可能),而现在你们还说,他的活动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公众和新闻界集中注意这些,那就可能不会出现另一起水门事件。特别是如果你们坚持说总统对此一无所知。

我立即给我妻子打电话,但她不在家。就像在这次旷日持久的磨难中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贝特西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我被解职的消息。我试图与在奥尔巴尼的母亲通话,但是电话占线。她在电视上已看到新闻发布会的实况,正在给我挂电话,但是那时我办公室的电话已受到干扰。

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的。我原已料到我会被调离这个机构,甚至可能被解雇,但是没有想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很多人曾告诫过我,说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我毕竟参与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两项重要秘密计划:伊朗行动和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前几个星期这两件事就已经传开了。在《风帆》周刊报道了秘密的伊朗行动以后,这件事本来已差不多过去了,但西方新闻媒介却又把它接了过来。在这之前约一个月,一架满载支援给抵抗战士的物资的飞机在尼加拉瓜上空被击落。桑地诺政府军抓获了一名机组人员尤金·哈森富斯,并缴获了一些文件,结果他们破获了萨尔瓦多的一个密室,在电话记录中发现了几个美国人的电话号码,其中有我的。这完全肯定了许多国会议员和记者早已知道的事实:尽管的确禁止我国政府的许多部门积极支持反政府武装,我们几个人,包括总统,却在悄悄地作出系列努力,使他们能继续活动下去。

既然两件事都已败露,我被迫辞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只是时间问题。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竭尽全力地工作,希望能减少损失和保护在两条战线上冒着极大风险帮助过我们的人的生命。

（有些人仍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本书不提他们名字的原因。）我们还抓紧时间营救仍被扣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11月初，一名人质，戴维·雅各布森获释，这是伊朗交易的一部分。他是以一种途径获释的第三个人。在整个事情败露之前，我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其他人质。

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甚至在戴维·雅各布森获释之前就结束了。在哈森富斯被打下来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要我在这件事上赶快“罢手并收拾干净”。很清楚，要牺牲掉某个人；我已做好了当牺牲品的准备。把我拿出来作为政治上的替罪羊是我们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凯西认为还会牵涉到另外一些人。他对我说，“老弟，如果这样，那就是你上面的人。”事情发生后，他说：“不会到你为止。”

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已准备离开政府。不知怎么的，我实际上盼着离开那里。我从海军陆战队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已经五年半之久，本来说好只在那里呆两三年，结果超出了一倍，这比我愿意和预料的长得多。我急待返回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所在地——北卡罗来纳的勒任营，在那里我可以愉快地重操旧业，发挥专长：指挥和领导年轻的海军战士。我希望有几天假与家人团聚，然后把他们带回北卡罗来纳，开始执行新的任务。我和贝特西曾详细商量过这件事。在我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中，她最喜欢勒任营。她跟我一样企盼着回到那里去。

但是现在——伙计，总不能那样快！

总统刚刚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中解雇了我。如果这样做真有必要，我认了。但是司法部长是怎样说的？可能涉及犯罪行为？

他是当真的么？我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政治灾难，而且可能会造成政治后果。但是即使在最可怕的恶梦中我也没有想到，我为总统，我的总司令做的任何一件事会导致对我提出刑事指控。